

民族主义与政治转型的相互影响

——以亚美尼亚为案例的研究

张 弘

【内容提要】 亚美尼亚的政治转型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联后期的公开化和自由化改革使得南高加索地区民族关系紧张，政治民主化使尘封的历史矛盾和文化宗教矛盾成为民族精英与大众对话的热点。民族主义对于亚美尼亚政治发展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快速恢复，为国家转型和重建提供了稳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限制了政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固化，甚至威胁政权的安全。超越历史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亚美尼亚实现民主固化、完成政治转型的重要挑战之一。

【关键词】 民族主义 政治转型 亚美尼亚 纳卡冲突

【作者简介】 张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亚美尼亚的政治转型在原苏联国家里属于一个特殊的案例，其政治转型过程始终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激烈冲击。在国家刚刚独立之初，在政治转型与民族国家的重新建构过程中，民族主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族主义与当代亚美尼亚政治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矛盾。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角度看，当代亚美尼亚民族主义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转型阶段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当代亚美尼亚政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族主义的制约，更不能以超越民族主义作为解决的途径。民族主义与亚美尼亚政治发展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相互扬弃，两者统一于亚美尼亚国家自身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

不同于其他原苏联国家的政治转型，亚美尼亚的独立过程与民族矛盾相伴而生。早在苏联末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产生，跨境散居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各民族关系因此变得紧张，沉寂多年的历史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矛盾伴随着苏联的解体逐渐浮出水面。其中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矛盾最为突出，实际上已经成为影

响亚美尼亚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矛盾始终是影响转型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凝聚民族感情的意识形态在民族国家塑造中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了长期困于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思想构建新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分裂动荡的始作俑者，它破坏稳定，造成分裂。消极的民族主义阻碍民族国家的发展，破坏社会的安定，使其脱离现代化的步伐，甚至引发政治发展的极端化。

一 当代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亚美尼亚人是欧洲南高加索地区的古老民族，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却出现在18世纪之后。欧洲的民族国家兴起，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亚美尼亚资产阶级的觉醒，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在当时的亚美尼亚社会出现。亚美尼亚民族在历史遭遇的大屠杀事件，以及近代历史上追求民族独立的文化，使得民族主义情结在亚美尼亚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相对于早期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思潮，当代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确实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政治改革使得被苏联共产党长期压制的民族、历史和领土矛盾不断重新提起，使长期潜伏着的苏联民族矛盾逐步表面化。1988年2月，主要由亚美尼亚人组成的纳卡州苏维埃通过决议，要求把该州划归亚美尼亚共和国管辖。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苏维埃积极响应，而阿塞拜疆当局则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在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阿、亚两族居民因“自决”问题发生流血冲突，导致30多人死亡，200人受伤。其后又发生了阿、亚双方相互驱赶对方在本国的居民的事件，到1988年年底已造成了3万多难民。冲突双方谁也不肯妥协，阿塞拜疆当局坚决拒绝纳卡州苏维埃变更领土的要求，表示不惜用武力维护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亚美尼亚的知识分子，包括地方苏维埃领导人要求解决历史问题的呼声很高，双方最终爆发了1988年的大规模冲突，苏联政府为平息这一事件作了努力，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苏联解体后，亚美尼亚重新获得国家独立，苏联中央对于纳卡冲突的管控逐渐放松。1991年9月，纳卡州成立共和国，宣布脱离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并从11月开始对亚美尼亚共和国实施经济封锁。随着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的进一步膨胀，这场延续数年的族际冲突很快升级为大规模的流血厮杀。亚美尼亚人追求国家独立的过程也是恢复民族利益和民族正义的过程，政治

家和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转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后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不仅掺杂着政治问题，还有着一定的宗教和文化分歧。应该说，从沙皇俄国开始，俄罗斯族与亚美尼亚族之间就存在着这种文化和宗教上的亲近感。处于信奉伊斯兰教民族包围的亚美尼亚族自身实力弱小，曾长期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他们将维持民族独立和生存希望寄托于外部盟友，俄罗斯族成为其宗教和文化上的紧密盟友。在整个苏联时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民族和领土问题在不断角力，而且联盟中央更偏向于亚美尼亚^①。

在苏联后期，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争取民族国家一同成长。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矛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代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复兴。由亚美尼亚知识分子组建的“卡拉巴赫委员会”成为推动该地区寻求脱离阿塞拜疆，要求在政治上回归亚美尼亚的主要力量。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该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紧张，也为后来的亚美尼亚脱离苏联争取独立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精英。在1990年，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派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成为议会中的主导力量，亚美尼亚的独立过程实际上是在这场民族冲突和战争中进行的。苏联后期，政治上主张民族主义的政党——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党（ANM）主席彼得罗相在1990年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由于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立场，该党在1990年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取得胜利，成为议会中的最大政党。1991年10月，彼得罗相顺理成章地以83.4%的得票率当选亚美尼亚首任总统。

首先，民族主义成为亚美尼亚最主要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基础。政党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着反映和聚合民意，整合政治体系，动员和发展政治力量，通过竞选以获取或参加国家政权；执掌国家政权，影响立法、行政、司法过程。通过参与选举获取政权或者监督政府。当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本民族的命运要交给本民族的精英集团手里，无论这个精英集团以什么方式产生，无论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在民族主义的语境里，只有本民族的精神才能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同时对该民族发生影响力，这种立场也是民族主义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②。当东欧和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破产后，种族和宗教划分便成为民族主义生成的主要动因。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本民族政治精英更加倾向于高效的行政体制，其中超级总统制成为议会中多数党

① 道明：《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② 戴金发：《论后现代时期的民族主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7期。

领导人的最佳选择。由于纳卡冲突的激化，刚刚独立的亚美尼亚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和领土压力，支持总统的议会制宪委员会在制宪过程中倾向于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因此，在亚美尼亚的1995年宪法中，半总统制规定的总统权力十分强大，议会缺乏制约总统的行政权，司法在一定程度也接受总统的指导^①。缺乏制约的总统制使得亚美尼亚的政治和民主建设进展缓慢，直到1995年7月，亚美尼亚的首部宪法才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通过。在1995~1997年期间，这部超级总统制宪法虽然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总统。这种强调执行力和效率的超级总统制具有一定的反危机特点，赋予总统在内政和外交上的超级权力，特别是在应对与阿塞拜疆的领土冲突问题上具有较大的决断力。但是，由于总统具有超级权力，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对于总统彼得罗相政治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质疑越来越多。

其次，民族主义也成为亚美尼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亚美尼亚独立以后，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取得了在纳卡地区的军事优势。但是，由于亚美尼亚不仅占领了纳卡地区，还占领了纳卡周边的阿塞拜疆部分领土，被国际社会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土耳其基于宗教和文化的因素，同情阿塞拜疆的领土要求，对亚美尼亚实行了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尽管亚美尼亚赢得了纳卡战争，但是经济封锁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许多居民被迫靠烧家具和砍柴来取暖。在1991~1993年期间，亚美尼亚经济下降达41%^②。虽然在战争结束后的1994年有所恢复，但是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达到5273%的空前水平，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紧迫的经济形势迫使执政的首位总统彼得罗相试图缓和与土耳其的关系，就历史问题展开对话，并表示愿意与阿塞拜疆在纳卡问题进行务实对话。

亚美尼亚独立以后，国内政治多元化趋势发展迅速，与此同时，超级总统制也越来越暴露出较多的弊端，亚美尼亚社会要求将国家制度从独立之初的反危机模式逐渐向调整正常的权力平衡模式过渡。独立之初的民族主义政治力量逐渐分化为温和的和解派和激进的强硬派。和解派要求政府推动国家的政治改革，通过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的妥协，缓与周边邻国——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关系。而强硬派则拒绝在纳卡领土问题上让步，特别是拒绝退出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

^① 1995年《亚美尼亚宪法》详见亚美尼亚总统网站，<http://www.president.am/ru/constitution>。

^② 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AM>

1998年2月，“和解派”以捷尔·彼得罗相为代表，主张接受进行斡旋的欧安会明斯克小组提出的和平方案，以纳卡“高度自治”换取和平；科恰良总理以及国防部、内务和国家安全部等强力部门领导人则组成“强硬派”，指责总统在谈判中让步太大，无异于“出卖民族利益”。执政联盟因此发生分裂。尽管在1996年举行的大选中，彼得罗相以51.75%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但还是不得不宣布辞职，提前举行新的总统大选，代表强硬派政治力量的候选人科恰良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并且随即开始亚美尼亚的修宪历程。

来自纳卡地区的政治家科恰良对于纳卡冲突的立场比较强硬，以他为首的政治力量被称之为“卡拉巴赫政治集团”。在苏联后期，他就积极参与纳卡地区的卡拉巴赫运动，创建了以后领导卡拉巴赫运动的社会政治组织“米阿楚姆”（亚文为“统一”之意），在该组织成立之初担任领导工作，并以该组织领导人的身份成为纳卡自治州执行主席的顾问。1989~1994年任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当选为“纳卡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1997年3月21日被任命为亚美尼亚总理。科恰良与其政治盟友、时任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谢尔日·萨尔基相共同构成了强硬民族主义的政党。

执政的科恰良同样面临着国家发展与民族感情的矛盾。拒绝在纳卡问题与邻国进行妥协则意味着亚美尼亚国家失去经济发展的机会，无法分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机会。与此同时，由于车臣恐怖事件，俄罗斯为了希望获得西方的理解，在纳卡地区的立场开始松动，美俄关系在外高加索地区的立场开始松动。亚美尼亚希望莫斯科能继续支持自己，抵御来自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压力，但俄罗斯出于对车臣问题的担忧，希望在纳卡问题上有所突破以期形成解决车臣问题的良好环境。自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动后，亚美尼亚国内出现了分歧。其中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分子1999年在议会中发动武装袭击，击毙了包括政府总理在内的多名高官。虽然自1994年以来，亚美尼亚经济有所增长，但社会财富严重不均，下层居民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辛，失业率超过30%，贫困人口超过一半。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外部安全环境使得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铤而走险，制造血案。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反映出，在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亚美尼亚的政治转型和经济改革实际上问题多多，越来越落后于周边国家。

二 民族主义与亚美尼亚的政治转型

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具有一定的全球性意义，都是引进西方的多元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从苏联内部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融入冷战后的全球经济。亚美尼亚的全球化和现代化需要克服的困难包括“去苏联化”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但是，由于恢复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复兴过程，因此二者存在着一个矛盾关系。长期被压制的亚美尼亚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西方化相互制约，特别是对于亚美尼亚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

首先，苏联解体后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激化民族矛盾。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开启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其中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公开化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控制。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扩大政治权力，也是扩大本民族文化和经济的自主权，无形之中就会波及少数民族的利益。政治改革不仅打开政治自由化的大门，也使得被苏共中央长期压制的民族矛盾和历史积怨重新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历史上的南高加索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各种宗教和文化不断融合，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民族矛盾，处于混居的南高加索各民族分离主义也很活跃。早在1987年，阿塞拜疆共和国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发生了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两个加盟共和国因该自治州的归属问题爆发了持久的对立，苏联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安抚暂时搁置了矛盾。但是，在苏联后期，两国之间围绕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再次升级，苏联政府的撤出使得矛盾激化，造成两个民族之间的敌对和仇视情绪越来越深。苏联末期，政治自由化改革使得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权力逐渐扩大，地方政府纷纷加强宣传本民族文化，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教育力度，通过行政立法，将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在教育体系加大使用主体民族语言的力度。1990年4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十一次代表的公开谈话中强调：“应该让各共和国的主权变为现实，赋予他们经济自主权、自由发展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等等。对待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区、任何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我坚信这条路是正确的。”^①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为

^①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

暗流涌动的族群矛盾公开化。

亚美尼亚从苏联统治下和平地获得民族国家独立，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使得压制百年的民族国家认同得到恢复，也使得亚美尼亚的政治转型过程掺杂了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和民族主义压力。无论是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还是苏联时期的民族矛盾，都是亚美尼亚政治无法回避的问题，成为独立以后的政治核心议题。亚美尼亚的独立过程也是解决历史问题、处理现实民族矛盾的过程。成熟政府在处理国家关系时都会选择对话和谈判，尽量避免使用武力。而处在政治转型中的国家却存在着非理性的选择，特别是在民族问题和领土冲突问题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恢复“历史正义”诉求使得矛盾升级，甚至导致地区局势的失控，突然开启的政治民主化转型可能引发一系列民族主义灾难。

苏联后期，中央政府对地方民族事务控制力的下降，以及自由化和公开化政策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一方的极端行为往往会招致另一方更为极端的反应。因此，民主化没有为高加索地区带来自由，反而将历史沉积的民族仇恨和历史矛盾重新活跃起来。在亚美尼亚政治转型之初，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都认识到说服大众的方法就是争夺选票，除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外，利用民族矛盾进行政治动员是最好的方式。在国家转型的起始阶段，不仅普通选民对新的政治制度不了解，精英本身同样也未必说得清楚，双方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在难以认同理性说服的情况下，民主就很容易异化为极端政治。这就如斯奈德指出的，一国经济发展的状态、制度的程序设计、社会现状的不合理，媒体发育水平的低下，综合地决定了公众和政治家政治行动的水准^①。

其次，民族主义绑架政治民主化。历史问题和民族矛盾的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政治转型的质量和速度，激化的民族主义不仅导致民族情绪的高涨，也会导致政治秩序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政治秩序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决策程序的非理性。高涨的民族主义严重限制国家决策选择空间，政治族谱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甚至会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绑架社会大多数的情况，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阻碍政府决策过程。另一个方面是影响政治精英的素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不仅是制度的程序化，还包括精英的民主化^②。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构建

^① 吴强、任剑涛：《全球化时代的新民族主义浪潮》，《东方历史沙龙》（第124期），http://www.sohu.com/a/159498660_120776

^② 马宝：《试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和发展、权力的合法性及政府行为合理性、民族经济增长以及协调民族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正向功能。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斯奈德所著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以上述三个问题为核心，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作的冒险决定^①。

再次，外部地缘政治压力也是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居高不下的的重要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其国内政治和解的进度。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作为其继承者在原苏联空间仍然扮演着裁判者和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的独联体外交主要目的是恢复其在原苏联国家的地区影响力，而将这些矛盾是其维持地区影响力的工具和筹码。1993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明确表示把独联体问题置于外交的首要位置，独联体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关系到克服国家危机的前景以及保证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正常生存”^②。叶利钦利用这些领土冲突和民族矛盾来拉拢和打压不听话的原苏联国家，吸引原苏联国家回归到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来。阿塞拜疆为了避免俄罗斯在纳卡冲突过分地偏袒亚美尼亚，被迫在1993年加入了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③。但是，由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正处于痛苦的经济转型期，缺乏政治解决危机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资源，苏联时期无法解决的民族矛盾到了俄罗斯时期更显得捉襟见肘，防止冲突扩大化成为叶利钦时期处理南高加索地区冲突的唯一选择。而来自西方的大国——美国并不重视南高加索国家，冷战结束之初的美国对原苏联国家政策的重心是俄罗斯，在俄罗斯巩固西方政治制度，防止左翼政党东山再起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冷战是否彻底完结。另一方面，美国为首的北约还将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重心放在中东欧，通过吸纳原华约成员国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及用“北约东扩”来填补欧洲的地缘政治真空。欧盟给予原苏联国家的影响力仅仅限于经济援助和人文影响，无力介入该地区的武装冲突。临近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土耳其和伊朗由于自身宗教和文化与阿塞拜疆立场接近，但是在亚美尼亚那里完全没有影响，不具备调停两国冲突的外交条件。

^① 马宝：《试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

^② Адомайт Х.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от Ельцина к Путину. - Киев, 2002. - С. 16

^③ Ниязов Н. С. Основные векторы политики во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94 - 2010 годы.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 ун - т, фа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 СПбГУ, 2010. С. 205.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末，纳卡冲突调停工作逐渐国家化，外部大国逐渐渗透到南高加索地区。纳卡冲突久拖不决使得阿塞拜疆逐渐将外交和经济重心转向美国和北约，阿塞拜疆还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无法保障本国安全为由正式退出该条约，转而向美国和欧盟寻求帮助。1994 年，阿塞拜疆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于 1996 年声明不加入俄罗斯牵头的对北约东扩的抵制行动。阿塞拜疆还积极参与“古阿姆”集团、“民主选择共同体”及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阿塞拜疆利用自身特殊的能源资源和地缘政治优势，加大了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积极邀请西方能源公司加入当地能源开采和运输体系建设。2006 年 7 月，西方积极推动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正式开通，成为阿塞拜疆能源出口流向实现多元化的标志性事件。

阿塞拜疆利用自身的能源资源和地缘政治优势，努力推动纳卡问题的国家化，美国和欧盟力量的介入，使得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的立场逐渐松动，对于亚美尼亚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这也引发亚美尼亚方面的不满。“对于亚美尼亚来说，在安全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俄罗斯。单纯的依赖不会有好结果。尽管许多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高层政界人士都承认亚美尼亚是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伙伴，但俄罗斯对待这位北方战略伙伴的做法却有点让人费解。”^①事实上，随着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俄罗斯外交的重心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经济利益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亚美尼亚经济严重依赖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缺乏技术和资源优势。而阿塞拜疆依托于石油资源开发和黑海地区运输管道，具有一定市场优势。俄罗斯对阿塞拜疆政策正趋于务实。

亚美尼亚设想政治解决纳卡冲突的最理想国际环境，是美国与俄罗斯在该地区实现地缘政治平衡，大国能够在该地区达成妥协。但是，他们也承认，这个想法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缺乏明显的政策，更谈不上明确的共识。亚美尼亚学者卡拉佩特·卡连强承认，“保证亚美尼亚安全最理想的方案是平衡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但这个理想的方案是无法实现的。”^②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响，美国的军事影响力逐渐渗透到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在阿富汗周边国家建立了一些军事基地，加大了对原苏联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政治干涉，通过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和民主

^① [亚美尼亚] 卡拉佩特·卡连强：《世界新秩序和亚美尼亚安全》，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② 同上。

价值观试图发动一系列的“颜色革命”。美俄之间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短暂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双方的分歧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国际秩序，还扩展到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在政治、安全互信上不但打破冷战结束以后的底线，经济制裁与反制裁也使得俄罗斯经济环境大幅恶化，因此也波及亚美尼亚的经济。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之由于乌克兰危机导致的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大幅衰退，使得严重依赖俄罗斯市场的亚美尼亚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地缘政治的困境也难以突破，国家整体形势越来越被动。

越来越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刺激了亚美尼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困难的经济形势一定程度上造成民粹主义情绪上升，二者相互影响的结果是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政治情绪的非理性化。目前执政的亚美尼亚共和党领导人大多来自卡拉巴赫，主要以罗伯特·科恰良和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部长谢尔日·萨尔基相为代表，该党不仅长期掌控亚美尼亚政治，而且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瓦兹根·萨尔基相的弟弟阿拉姆·萨尔基相短暂出任总理，2003年罗伯特·科恰良连任总统，2007年谢尔日·萨尔基相出任总理。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来自共和党的萨尔基相击败了前总统彼得罗相和前议长阿尔图尔·巴格达萨良，当选总统，谢兰·奥加尼扬任国防部长，2013年谢尔日·萨尔基相击败首任外长拉菲·奥瓦尼相连任总统。卡拉巴赫集团掌权后，逐渐形成共和党影响力超过半数的局面，强硬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共和党的政治伙伴——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较强的政党。该党又称达什纳克楚琼党，是亚美尼亚议会的主要反对党，该党是一个激进主义政党，其思想基础是民族民粹主义，1995~1998年曾因为涉嫌恐怖主义活动而被禁止在亚美尼亚活动。该党主张纳卡与现土耳其境内的西亚美尼亚合并，并要求国际社会承认1915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行的“宗族屠杀”事件等，在海外侨民中享有较高声望。

亚美尼亚的政治精英普遍具有的民族主义立场不仅来自他们的政治选举策略，更来自民族文化中的悲情意识。长达一百年的外族统治历史，特别是1915年的大屠杀事件是这个民族难以跨越的心结。在与土耳其、阿塞拜疆等邻国化解民族矛盾和历史问题之前，极端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亚美尼亚社会的主要压力。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治转型的速度，他们不同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一些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精英，不仅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应用在国家主权

和独立，而且还应用于国内政治斗争和竞争。

结 语

一方面，化解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地缘政治环境尚难具备。民族主义是亚美尼亚民族在短时间内难以化解的历史情结，是追求民族正义的社会诉求。这里不仅有其内部的历史悲情限制，同时周边相关国家也不具有对应的和解准备。民族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地缘环境，离不开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体系。南高加索地区各民族长期以来不断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交流历史。许多历史矛盾、宗教矛盾和领土纠纷都难以通过战争或者国际诉讼分辨出是非曲直。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作为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弱小民族，长期受到周围帝国和不同宗教的统治。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和恢复历史和民族的正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诉求。苏联的解体和冷战后全球化的兴起为亚美尼亚人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时机，但是民族国家不仅要追求主权独立，还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任务。土耳其在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限制了亚美尼亚社会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化解。近年来，已经有多个国家认定奥斯曼帝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屠杀。土耳其政府也曾多次以召回大使的手段进行抗议。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29个国家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当年大量杀害亚美尼亚人的行为为“种族屠杀”，包括俄罗斯、法国、瑞典、巴西、委内瑞拉、比利时、希腊、梵蒂冈等国^①。2016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举行表决，通过了此项决议，认定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的是“种族灭绝”。作为回应，土耳其当天立即宣布召回驻德国大使。可见，实现民族矛盾和解的国际环境仍不具备，幻想亚美尼亚社会的自我和解是不现实的。强硬的民族主义不仅给亚美尼亚社会带来安全压力，对立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限制了亚美尼亚参与高加索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虽然亚美尼亚加入了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但对于一个内陆国家而言，没有领土接壤的俄罗斯很难为其经济发展创造增量。特别是与阿塞拜疆、土耳其这两个重要的邻国难以恢复正常的经济联系，领土和历史矛盾限制了亚美尼亚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因此，如何超越历史的民族主义也是亚美尼亚国

^① 《德国认定亚美尼亚惨案为“种族灭绝”土耳其召回驻德国大使》，http://china.cnr.cn/yaowen/20160603/t20160603_522310941.shtml

家发展需要解决的课题。

另一方面，超越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内政治基础仍不具备。长期以来，亚美尼亚社会存在着两种发展道路的竞争。一种是坚持自主发展，通过维系与俄罗斯特殊盟友关系，抵御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经济封锁压力。另外一种道路则倾向于欧洲一体化道路。地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亚美尼亚将国家发展的希望寄予与欧盟的一体化。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欧盟的地方伙伴关系计划不断实施，亚美尼亚社会出现了倾向于加强与欧盟关系的发展道路。这种欧洲一体化倾向鼓励将国家的重心放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而不是急于化解安全危机和领土争端。如何达成社会共识已经成为超越极端民族主义漩涡的国内政治条件，没有共识就不可能出台新的政策。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助于民主秩序的形成，使得政党竞争的核心内容能够从历史矛盾和民族主义议题转移到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上来。目前亚美尼亚的政治精英仍然热衷于民族主义话题。亚美尼亚的反对党同样在纳卡问题上态度强硬，主张在搁置冲突的前提下实现与欧洲一体化，发展与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关系。在 2017 年的议会选举中，察鲁基扬领导的繁荣亚美尼亚党、前总统彼得罗相领导的“亚美尼亚前途联盟”都反对在纳卡地区撤军^①。目前看来，这种社会共识仍然比较难以达成，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仍有较大的民意基础。

因此，从极端民族主义在亚美尼亚的发展历史看，实现政治转型的社会条件不具备。在未来的中期时段里，亚美尼亚的政治转型必然继续经历反复，直到社会共识的形成。原苏联国家的政治转型具有极其复杂的环境，不仅在内部需要进行制度建设，搭建出正常的民族国家，还依赖于外部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矛盾和民族传统都有可能国家政治转型方向和质量发生严重偏离。从亚美尼亚的案例看，小国的政治转型不仅取决于内部的政治经济因素，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从亚美尼亚的政治转型历程来看，外部的大国约束可以成为中小转型国家是否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陆齐华)

^① 《亚美尼亚共和党》，<http://www.ru.wikipedia.org>)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_партия_Армении；《繁荣亚美尼亚党》，<http://www.bhk.am/>